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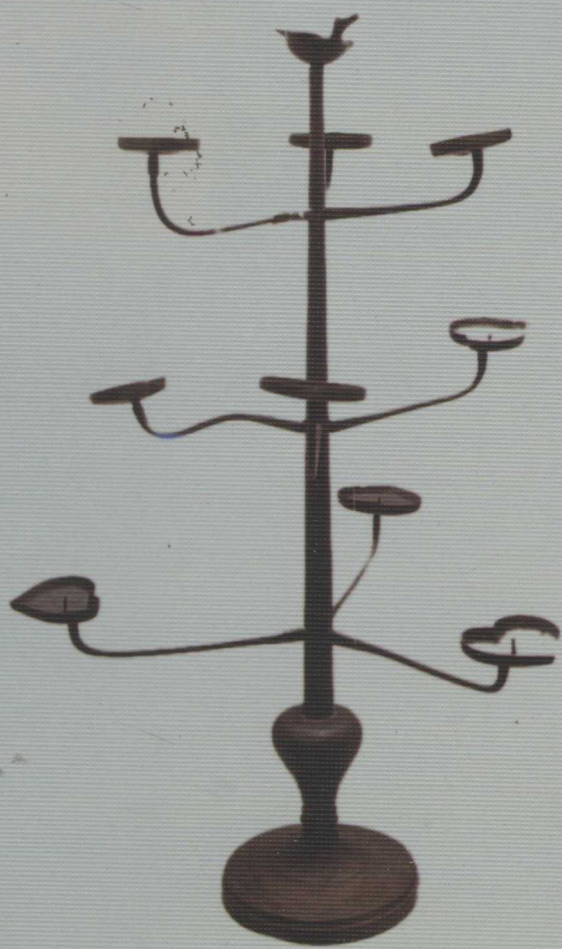
百越研究

BAIYUE YANJIU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四次年会论文集

第二辑

陆勤毅 吴春明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四次年会论文集

百越研究

(第二辑)

安徽大学历史系

南京博物院民族民俗研究所 合编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越研究(第二辑)/陆勤毅 吴春明主编.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81110-980-1

I. ①百... II. ①陆... III. ①百越—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②百越—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7250 号

本书出版得到安徽大学 211 工程三期“徽学与地域文化”项目经费资助

百越研究(第二辑)

陆勤毅 吴春明 主编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刷: 安徽万德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210mm×297mm

印张: 21

字数: 642 千字

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0.00 元

ISBN 978-7-81110-980-1

责任编辑: 马晓波 刘 红

装帧设计: 孟献辉

责任校对: 刘 红

责任印制: 赵明炎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5106311

主 编 陆勤毅 吴春明

执行主编 周崇云 陆建芳

本书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新天 王 箐 兰达居 朱华东 陆建芳

陆勤毅 吴春明 张爱冰 周崇云 黄向春

目 录

一、百越族群及周邻关系

先秦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历史地理概说	石 泉(武汉大学历史系)(3)
大禹与百越关系简论	徐日辉(浙江工商大学旅游学院)(14)
商代南方疆域的考古学探索	宋 叶、王新天(福建泉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厦门大学历史系)(19)
论西周王朝对江淮的经略	徐 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学系)(27)
太平洋考古学与中国东南沿海	焦天龙(美国 Bishop 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33)
白莲洞文化与东南亚史前文化的比较研究	蒋远金(广西柳州白莲洞博物馆)(39)
红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华南的关系	吴春明(厦门大学历史系)(44)
北盘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区域共性与个性	张兴龙、王新金、张改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57)
岭南龙山时代文化的多元性	何国俊(厦门大学历史系)(66)
百越地区与东夷地区史前文化交流	
——以花厅墓地为例	黄建秋(南京大学历史系)(74)
徐夷、东夷与越人关系研究	徐心希(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85)
东周养国墓葬出土玉器的多元文化因素分析	
——以河南桐柏月河一号墓为例	石荣传(中国海洋大学艺术系)(92)
史前时期海南岛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	丘 刚、李 钊(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01)
桂东北和西江中游区东周越人土坑墓及族属探讨	
——以墓葬随葬陶器为例	何安益、宁永勤(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资源县博物馆)(105)
洞庭苍梧族属考	覃 芳、姚卯秀(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平乐县文物管理所)(113)
西南夷初探	肖明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20)
巴人崛起与西渐的考古考察	
.....	郭立新、夏 寒(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南京审计学院国审院)(125)
从考古看骆越与滇的文化关系	卢智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33)

二、百越文化专题研究

古代历史中的气候变迁与文化崩坏

——中国与中美洲的比较研究 …… Barry. V. Rolett (著)、李慧琳(译)(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145)

东南地区史前的采集渔猎文化…………… 郭琼娥(厦门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系)(148)

对马家浜文化稻作来源的一点思考…………… 李振金、曹 峻(上海大学历史系)(156)

论台湾高山地区的史前聚落

——以曲冰遗址为例…………… 陈仲玉(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60)

繁昌汤家山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张爱冰、陆勤毅(安徽大学历史系)(168)

吴越系青铜剑纹饰及其相关问题…………… 朱华东、周崇云(安徽大学历史系)(178)

百越民族丧葬文化初探…………… 蓝达居(厦门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系)(183)

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初论…………… 陈元甫(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89)

靖安李洲坳东周墓葬的性质与族属…………… 徐长青(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

南海沿岸岩画所反映的宗教与艺术…………… 肖一亭(珠海市博物馆)(204)

百越族“鼻饮”刍议…………… 葛国庆(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212)

殷墟卜甲和青铜铭文中的越人鸡卦辨析…………… 黄懿陆(云南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219)

闽越地区崇蛇习俗略论…………… 林蔚文(福建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231)

先秦时期岭南社会的复杂化及原因

…………… Francis Allard(著)(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系)

程 玲、赖姗姗、王庆华(编译)(厦门大学历史系)(240)

三、百越视野下的华南民族志

“游艇子”与南岛人…………… 黄向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249)

广西龙胜平安寨壮族的社区内源结构…………… 李富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254)

浙南畲族村落社区中的汤夫人信仰…………… 王 道(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261)

黎族历史上的“生黎”与“熟黎”…………… 王献军(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67)

海南黎族图腾浅议…………… 张一平、阎根齐(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大学文学院)(274)

论民国时期黎区贸易对海南岛内市镇发展的促进作用…………… 张兴吉(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79)

对雷州石狗文化研究的几点认识…………… 邱立诚(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85)

台湾原住民的类别与族称述论…………… 周典恩(安徽大学社会学系)(292)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贸易研究…………… 郭志超(厦门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系)(298)

台湾原住民宗教信仰的变迁…………… 彭维斌(厦门市博物馆)(305)

清政府对台湾原住民的统治政策及其对原汉关系的影响…………… 周雪香(厦门大学历史系)(318)

一、百越族群及周邻关系

先秦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历史地理概说

石 泉

(武汉大学历史系)

一、商周时期长江下游开发概况

(一) 湖熟文化的出现与分布

湖熟文化是因最早于 1951 年在江苏省江宁县南的湖熟镇发现的遗址而得名的。其分布范围在长江下游两岸,东以茅山为界,西、南皆入安徽省境,北至江淮间。目前,已发现有近 200 处遗址,以宁镇丘陵和秦淮河流域为最密。经碳 14 测定,时限为公元前 1540 ± 90 ~前 1195 ± 105 年,大致相当于商代中期至西周初期。这是一种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显著的地域性文化。出土的器物中已有少量较原始的小件青铜器,不过制作的技术水平较低。另有大量新石器及少量几何印纹硬陶出土。

在同一地区,主要在苏南丘陵与河谷平原上,分布着许多大小不等的土墩墓。时代大致从西周前期到春秋战国之际,上限与湖熟文化衔接,下限则与春秋战国时的吴、越国的时代相连。其出土器物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但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湖熟文化和苏南的土墩墓究竟与文献中的哪些史实可以印证,尚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无论如何,它确已反映出这一带从西周时期起,已经开始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铜器时代的早期,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

(二) 商周文化的南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在余杭、吴兴、海盐、安吉等县发现了商代青铜器,如钟、鼎、甗、觚等器物,与中原所见无异,但纹饰则具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在安徽省的肥西县(今巢湖西北、合肥市西南)境内也发现了商代青铜器,这说明商文化已进入淮南、江南地区。

江苏省的淮水以南以至江南则尚未发现商代器物,但西周初期的文化遗存,则有重要发现,即丹徒烟墩山出土的一批西周铜器,其中的“宜侯矢簋”有铭文 126 字,记载了周康王封宜国的事,但这个宜国究竟在今天的何处?则尚待研究。

此外,在苏北的仪征(今扬州市西南、长江北岸)和苏南的江宁、丹阳等县也发现了西周墓和窖穴。

安徽省的淮河以南,于 1953 年在嘉山县、1971 年在肥西县、1973 年在潜山县,发现了西周铜器。在江南,1959 年,屯溪发现了大量的西周器物,共出土 300 余件,器物大都成群成组,青铜器、釉陶和几何形印纹硬陶都具有浓厚的南方特色。

总之,商周文化南下到长江下游的迹象是不乏具体物证的。但因研究还不够深入,尚不能做进一步的论述。

(三) 东南沿海各省的“百越文化”

这类文化遗址的共同之处是,都出土有大量几何形印纹陶器和有肩石斧、有段石锛。过去多年来,考古界一直误以为它们属于新石器文化。近年始知不然。现在对这一文化系统的分期是:早期(产生期)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但并非直接从良渚文化发展而来),中期(兴盛期)相当于中原的商代与西周时期,晚期(衰落期)相当于春秋战国以至汉初。在中期的有些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器,其形制等接近于商周铜器,这反映了商周文化对它们的影响。同时,这也是几何形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器以及釉陶的发展、兴盛时期。

这一文化系统的分布状况:中心在江西和福建两省。遗址最多,时限最长(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战国汉初)。由中心向北,延伸到苏南和浙江省。江苏的这类遗址最早的是商代中期至周初,下限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中心往西,发展到皖南、鄂东、湘东一带。时限一般也较短,如湘东的遗址多只限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中心往东及南,则到达海边。总之,分布很广。在南方的商周遗址中大都印有印纹陶,并且传到了中原。在中原的商周墓葬中,有些也往往有少量印纹陶出土,这反映了南北文化交流和人口迁徙的史实。

我们称这一文化系统为“百越文化”,即因其分布范围与文献记载的百越分布范围基本一致,时代也大致相符。虽说它是一个文化系统,但并不意味着它只是一个民族。因为同一文化系统,在不同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而物质文化特征很相似的,也未必就属于同一民族。

(四) 文献记载中关于商周时期的长江下游形势与开发状况

从分布的情况及其时限来看,大汶口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应属于早期的东夷部落集团。到商周时期,淮河中下游的“淮夷”、“徐戎”、“群舒”也屡见于金文。

徐国是商周时东夷中最大的国,其领土的中心在淮北、鲁东南,即淮河流域中下游的北部。曾长期与商周抗衡。到西周后期,因屡遭周人及其统率的诸侯国的攻击而衰落。《禹贡》中的九州就有徐州,其州境大致同古徐国,这也反映了当时徐国作为东南大国曾有过的历史地位。汉魏六朝一直有徐州。后渐渐缩小,以迄于今。

淮河以南是“群舒”分布之处,亦即徐人的旁支。

东夷中另一个更早的著名人物——皋陶,其后人的封国也在淮南。皋陶是“偃”姓,与徐国君子的“嬴”姓为双声,可以互通。其东南面就是群舒(亦即“群徐”)之地,彼此都是东夷,文化自必相近,大汶口(青莲岗)文化与随后的龙山文化都是跨越淮河、长江,联为一气的。从新石器时代就已如此。因为淮河不宽,易渡,长江下游的南京与镇江本身都是较好的渡口,而这一段又是长江与淮河的最近处。正因这一带的南北交通便利,所以长江下游的开发,受北方东夷的影响更大些,特别是江北、淮南一带。这从古遗址的分布情况也可看出。

总之,商代与西周时,对于长江下游的开发,东夷起了很大作用,而东南沿海各省的初步开发,百越实为最早的主力。

二、春秋时期吴、越之兴起、强盛与吴、越都城地望问题

(一) 春秋前期长江下游地区概况

春秋前期,楚国在长江中游北部地区开始兴盛。下游则无突出表现。江南宁镇地区的河谷平原为湖熟文化的继起者,即在这一带留下了大量土墩墓葬的居民(见前述)。

江南广大丘陵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人(印纹陶文化的创造者),在春秋前期已有一部分(主要在江浙一带边缘地区)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但不同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直到汉武帝初年,还有不少住在河流上中游河谷地带的越人,仍停留在原始社会的水平(详后)。总的说来,从这时起,印纹陶文化的发展高潮已过,渐渐走向衰落。

在淮河两岸的淮东地区,徐国仍然存在,但已不再是著名的大国,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日微,保存下来的有关史料也不多。淮南大部分仍是“群舒(徐)”的居地,分散性很大。从春秋中期起,开始受到楚国的侵袭。

总之,当楚庄王声势煊赫,称霸中原,并且开始向淮河中游发展时,长江下游及淮河中下游地区尚未形成一个继西周时徐国之后的、新的地区势力。

(二)春秋中晚期吴国的兴亡和越国的兴起

春秋中期,楚庄王全盛时,吴、越二国始见于《左传·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楚庄王十三年)。这年,楚攻群舒之叛,灭舒蓼,正疆界,“反滑汭,盟吴越而还”。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楚败晋,楚庄王称霸中原。十几年后,楚共王时,吴王寿梦(又名乘,公元前585~前561年在位)即位后不久,吴国与晋国建立了联系。晋派遣楚国的逃亡贵族屈巫臣及其子屈狐庸去吴,将晋、楚先进的军事制度与战术带到吴国,并助吴加强外交活动,促使其攻楚,以牵制楚人北进。于是,吴开始强大。这时,吴国内部的经济、文化必然也在发展,才能支持其对外日益加强的活动。

公元前584年,吴开始伐楚、伐巢(今淮南)、伐徐(今淮北),楚师“奔命”(紧急增援)。楚师伐郑(今河南新郑县),中原诸侯出兵救郑,吴国也参加了。吴师又乘虚攻入楚之州来城(今安徽寿县北,凤台县境,在淮河北岸),迫楚回师自救,弄得楚师“一岁七奔命”^①。

两年之后,中原各国就开始与吴国会盟,正式建交,并继续加强联系。这对于牵制楚国向中原发展,起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此后将近百年间(公元前584~前488年),吴楚长期争战。吴军胜多败少,渐占优势。楚灵王时,曾屡次对吴国大举进攻。他本人长期驻在东境的乾谿(今安徽颍上县北,西淝河右岸),经营淮河流域,与吴抗衡。结果并无进展,反而导致自己在内变中垮台(公元前529年)。此后,吴更强大。吴国经济文化继续发展,标志之一是吴王寿梦的少子季札,于公元前544年访问中原各国时的言行,反映了吴国贵族的思想文化水平已能达到的最高度,同中原的水平已相差无几。但总的说来,基础还不如中原及楚国雄厚,一般水平还低些。这从逃亡到吴国的楚国贵族往往成为吴国很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如伍子胥、太宰嚭等)可以推知。

由于吴越邻近,彼此有矛盾,越弱而吴强,受到吴国的压力,于是楚人便联越以牵制吴国。公元前538~前537年,越人开始与楚联合侵吴。公元前510年,越君允常也开始强盛称王,并屡次与吴国发生战争。

公元前515年,吴国阖闾(又名光)即位,重用伍子胥等,进一步改革军政,国势更强。而楚国则反之,统治者日益腐化,内部矛盾尖锐。公元前506~前505年,吴国联合蔡国、唐国大举攻楚,直下郢都。楚昭王奔随,几乎亡国。但吴人并未很好地巩固战果,终于在楚人随地组织抵抗和秦军支援下,以及越人乘机攻入吴境的威胁下,被迫退回本国。此后,吴越战争屡起,规模日大。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大败越军。越王勾践服属于吴,仅免于灭亡。吴国声势更强,于是开始北进,争夺霸权。而楚越则趁此时机恢复了国力。

公元前488年以后,吴人开始北攻。公元前487年,首先迫使鲁国服属。公元前486年,“吴城邗,沟通江淮”^②,为大举北进做了准备。公元前485年,吴齐艾陵之战,大败齐师。中原小国纷纷归附。公元前482年,吴又向西进军,与晋定公会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开封市北,当时的济水南岸),迫使晋国承认吴国的盟主地位。

但就在这时,越王勾践乘虚起兵攻入吴境,打进了吴国都城,吴军退回。由于连年北侵,吴国国力疲困,再也无力压倒越国,主动权到了越国手里。此后,在越国的几次进攻下(楚国也从西面进攻,收复失地),吴于公元前473年灭于越。这时已是春秋末期。

^① 《左传·成公七年》。

^② 《左传·哀公九年》。

(三)关于吴、越都城地望的疑问与新解

春秋中晚期,长江下游地区先后迅速兴起了吴、越两个大国。其国力的形成,必有经济的发展和相应的地理条件作为支撑。因此,它们的都城以及相应的重心地区所在,是我们进一步探索长江下游开发层次与规律的基点之一。

史学界一向认为,吴、越都城都在江南。吴都先在今无锡,后迁苏州;越都则在浙江绍兴。但如果我们结合先秦至汉初的一些有关记载来看,就会感到这种说法未必可信。童书业《春秋末吴、越国都辨疑》^①指出,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时,吴都城当在江北淮南。我们则认为,自吴王寿梦以来,吴都就已在淮东的南岸。现摘录童文中的一些说法,并做一些补充,综述如下:

1. 童文引《国语·吴语》,谈到越人趁吴军大举北上与晋人争霸、会于黄池之时,袭吴,“沿海沂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韦昭解:“……或有‘淮’字,误尔。”)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前面说“沿海沂淮,以绝吴路”。如果吴都在苏州,则沂淮之越军怎能败太子友于吴郊?因此,只有吴都在淮水边才讲得通。后文又讲越王勾践亲率大军,沂江淮,攻入吴都的外城。韦昭说“淮”字误,其实未必误,因为淮水亦可称“江”,“江淮”连用,往往是指淮水。^②

于此还可补充两条旁证:第一,春秋后期百年间(公元前584~前488年),吴楚战地主要在淮河流域,而不在长江边(有几条记载中的战地被后人解释为在长江下游者,也都未必然)。如果吴都在江南的苏州,则应经常利用长江水道进行活动才是,但从记载中却看不出有此情况。这也反证了吴都不在江南。第二,春秋晚期,吴人连年北征,有时还走海路。如果吴都在江南,则北上(特别是由海路到山东半岛)似不能如此近便。早在吴王寿梦二年(公元前584年),吴就曾伐淮北的郟国(今山东郟城县)。寿梦初年是吴国开始兴起之时,境土不很大。如果吴都在江南,恐道途过远。除非吴国境土至少已包括江南及淮南,才说得通。而如果吴都在淮域,则顺理成章,不难解释。并且这两条旁证也反映了自吴王寿梦兴起以来,中经吴楚在淮河流域上百年的频繁战争时期,吴都一直在淮河流域。

2. 童文谈到上引《左传》“吴城邾,沟通江淮”,并联系一系列金文材料,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的“禺邾王壶”铭文关于吴晋黄池之会的记载,指出金文中的“邾”亦做“干”,邾(干)王即吴王,吴国亦称干(邾)国。据许慎《说文解字》,邾本故国,属东汉时临淮郡(见卷六下,邑部)。一般认为,邾在今扬州市附近,已在江北。但这与上引《国语·吴语》所记,仍不甚合。《玉海》(南宋末王应麟编)卷一三八引《邾侯家传》(唐人著作),记邾侯李泌(中唐宰相)的祖先在北周末年曾参加“破陈(将)吴明彻于邾”的战役。《资治通鉴》卷一七二陈宣帝太建十年(公元576年)对这一战役有具体描述,明言吴明彻军被歼灭的地点是在“清口”。胡三省注:“即清水入淮之口。”清水即当时的泗水,在今江苏清江市西北,淮河北岸。^③据此,则《邾侯家传》所记之“邾”应即“清口”之别称。《方輿纪要》卷二十二之江南四,淮安府清河县(今清江市,县境包括今淮阴县)有“吴城”,在县西二十里,并引《会要》云:“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罢楚州吴城县为吴城镇。”这说明“吴城”至迟在南宋初年还曾设县,名称渊源自当更早。这个古城与《邾侯家传》所记之“邾”的地望相合,而又称“吴”,就更有力地证明了吴都(邾)在淮东,即今清江市西。

那么,又该怎样解释《左传》中“吴城邾,沟通江淮”的古记载呢?如果邾在淮河南岸,则吴国北征,由淮河流域出发,何用沟通长江与淮河间的水上交通线?对此,就又牵涉此“江”是否指的是今之长江的问题了。拙文《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之第一部分,曾着重考释汉宣帝以前的古“四渎”(江、淮、河、济)之“江”不是长江,而是今山东的沂河。吴国“城邾”以后的“沟通江淮”可否理解为:从邾城(今清江市附近)出发,开凿一条连接淮河与今沂河(古“江”)的运河?我看是可以的。古代“四渎”都直接入海,现在的沂河久已是入淮的支流,很可能其开端就是吴人当时“沟通江淮”的结果。

① 《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第108~1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② 拙文:《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一文中有详考,请参阅,见《文史》(6),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③ 参阅《读史方輿纪要》卷十九之江南一,总序“清河”条。

郭沫若《吴王寿梦之戈》^①一文,对故宫博物院保存的一件青铜戈头铭文——“邗王是𡵓,乍(作)为元用”8个字,进行了考证。认为“是𡵓”(𡵓音“莫”)是“寿梦”的音转,邗王即是吴王。邗亦做“干”,其考释与上述金文基本一致。这一考释是有道理的。据此,吴王寿梦就已称为“邗王”。则吴之都邗,在淮河流域,就绝不仅末年的夫差一代,而且可上溯至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吴国开始兴起之时。

3.《史记》、《汉书》所记汉初的一些有关材料,也可作为旁证。《史记》卷五十一《荆燕世家·刘贾传》云:“(汉高祖)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荆”栏原注:“都吴。”《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荆王刘贾传》末的赞语云:“荆王……镇江淮之间。”淮东即淮水下游地,不包括长江以南。刘贾“王淮东”,“镇江淮之间”,而“都吴”,则此“吴”城绝不会在江南的吴县(今苏州市),而只能在淮东地区,这就同上文所考吴都位置正好相符。

4. 吴、越两国共“三江、五湖”之地,屡见于古记载。例如:《国语》卷二十《越语上》记伍子胥劝阻吴王不要许越求和时说:“夫吴之与越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也。”又《越语下》记范蠡劝越王勿许吴时也说:“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越语下》还记载越王勾践初年,“兴师而伐吴,战于五湖,不胜,栖于会稽”。灭吴之前,“兴师伐吴,至于五湖”。“三江”之城,在今存古籍中最早见于《尚书·禹贡》。所谓“北江”、“南江”、“中江”,究竟在今何处,前人议论纷纷,迄无定论。至今也并无任何可靠材料能确证长江下游曾有三条较大的古水道。古代沂水、淮水即都有“江”称,则《禹贡》至《汉书·地理志》所记的“三江”,也未必都是指今长江下游的分支水道。淮东一带也是大平原。江淮之间,河网纵横,岔流很多。先秦时的“三江”就在这一带(包括淮水与长江),也是很有可能的。

“五湖”也未必就是太湖。淮东地区也有“五湖”之名,直到宋代仍有记载。《宋史》卷三六九《刘光世传》云:“……兼淮南宣抚使……五湖捕鱼人夏宁聚众千余,掠人为食……光世皆招降之。”祝穆(南宋人)《方輿胜览》卷四十六淮东路高邮军·事要·山川“五湖”条原注:“去城六十里,在高邮西北”,并引宋人诗三首为证,其中秦少游诗:“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如贯珠。”蒋颖叔诗:“三十六湖水所潴,其间尤大为五湖。”这些都反映了“五湖”在淮东的突出地位,其位置正在今清江市(故吴都)以南的两三百里处。吴越之间的“五湖”或当在此。

5. 吴、越国境相连,吴都如在淮东,越都自亦不能远在绍兴。公元前601年(楚庄王十三年),楚军进入淮南,灭舒蓼,打到今安徽中部,开始与吴、越订盟。^②这说明越必近楚。如果越都在绍兴,则与楚相隔多重山水,未免过远,不大讲得通。此后,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越人曾两次参加楚师大举攻吴之战,地点都在淮河流域。第二次,楚国以水师攻吴,越军会师于淮水边,并赠给楚王“乘舟”。结果楚军无功,退军。吴人跟踪前进,灭了淮河中游南北岸的巢及钟离。从这一战役的地理形势看,越都也不能远在绍兴。如然,越师将走哪条道路来与楚会师,并且还能“归王乘舟”于淮上呢?

6.《国语》卷十九《吴语》记越王勾践于灭吴前不久(公元前475~前473年间),曾对楚使申包胥说:“越国南则楚,西则晋,北则齐。”(东面是海)应该指出的是:越国此时尚未迁都琅琊。如果越都在浙江绍兴,方位就全不对,应成为西则楚,北(偏西)为晋才行。而越王却说“南则楚”,可知越在楚北。这样,越国就只有也在淮东及安徽东境的淮南丘陵地,才讲得通,因为楚国是不可能在绍兴以南的。

7. 越在吴东,史有明文。《国语·吴语》记伍子胥自杀前说:“悬我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③《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传》记子贡为鲁说吴王云:“请东见越王。”如越都绍兴、吴都苏州,则越乃在吴都正南,又怎会说“东”呢?而如果吴都在淮东(今清江市西),则越都更不可能在绍兴,只能在吴国东面的淮东沿海一带,北自鲁东南,苏北连云港东海县,南至长江两岸的狭长地区。

8. 越王勾践灭吴(公元前473年)后5年,即迁都琅琊(今山东胶县南、青岛市西南)。如果越都原

①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第141~146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

② 《左传·宣公八年》。

③ 《史记·伍子胥列传》。

在绍兴,哪能立即北迁得那么远?所迁之地,必然早有基础,才有可能。故越国旧都及中心地区亦当在淮东苏北鲁西南一带,才符合上引越王在灭吴迁都以前对申包胥所说的越与邻国的相对方位——“南则楚,西则晋,北则齐”。

9. 从语言上也可找到吴都不在苏州、当在淮南的旁证。《史记·货殖列传》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汉代的徐县与僮县,据《汉书·地理志》,皆属临淮郡,在淮北(今安徽泗县北,黄淮平原东部)。习俗与北方中原地区近似。东楚的东海在淮北(今徐州以东至连云港一带),北至鲁东南;广陵在江淮间。吴都如果在江南(今苏州一带),则语言属现在的“吴方言区”,与淮北徐、僮一带的语言习俗相差太远了。

综上所述,春秋时的吴、越都城及其周围的重心地带似当在江北、淮东。吴都在淮南(今江苏清江市西);越都则在吴都以东,近海处,具体地点则不能确定,估计不会在灭吴后迁都所至的琅琊以南过远。“江南说”形成于东汉时。最早已见于《汉书》,以后随《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的写成与流传,逐渐为后人所宗。但作为春秋晚期两大强国,吴、越的都城如果确在今苏州及绍兴,当地应有规模相当的古城遗迹与相应的古墓群,但迄今考古界并无相应的发现可资印证,先秦古籍所记又不相合。在地理上,如果联系此后战国秦汉时江南开发的情况来看,亦似不合规律。下至两汉时期长江下游的开发,重心始终在江北、淮南。如果在春秋晚期,江南(浙江一带)已成为两大霸主国——吴、越的都城所在地,则其经济开发与相应的文化教育,应已有较高的发展水平。但直到汉初,江南一带还是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不高、贫富分化不显著的落后地区。像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与地理开发状况,怎能产生并维持像吴、越这样迅速兴起的大国呢?这也反证吴、越的重心地区及其都城当在淮东、江北一带,而不应在江南。

总括春秋时期长江流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开发情况,在明确了楚及吴、越的都城及其相应的重心地区各在汉水中游及淮水中下游地区,而不在长江边以至江南之后,我们就可以较清楚地看到:春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展层次是先北后南,较先进的地区在北部接近中原的河谷平原地带。能主宰南方,并北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的楚、吴、越等南方大国,就是在这一带兴起并发展起来的。这些以土著文化为基础的南方大国,首先是楚国长期与中原各国交往,而且日益频繁。到春秋晚期,经济文化水平(特别是楚国)已与中原华夏诸国日益接近,并走向融合。虽然地方特色仍然明显,但其共性已日益增强。下至战国时期,就更进一步沿着这一历史趋势,形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了。

长江两岸,特别是江南广大地区,在这时的开发水平还很低。但同楚、越已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本身也有较缓慢的发展。至于比较显著的开发,则是500年以后的事了。

三、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统一与楚文化的广布

(一)战国初期长江中下游的局势

战国初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各国首先进入社会变革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齐、晋等大国终于都由实行了有效的变法革新措施的大夫们建立了新型的集权王国——三晋(韩、赵、魏)与田齐,其他的小国也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以适应新形势。

在中原各国内部动荡、无力外骛之时,定都琅琊的越国由于内部还相对稳定(尚未发展到像中原各国那样的动乱阶段),因而继续保持了几十年的东方霸主地位,直到越王朱白时(公元前449~前412年在位)。此后,黄河中下游的三晋(首先是魏国)、田齐陆续在变法革新方面取得成效,逐渐强大,并向外发展。越国则开始相形见绌,霸主地位遂被魏国取代,但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与江淮以南落后的同族——百越,有着一定的联系。

楚国这时也尚未出现社会变革的动荡局面。当时曾趁越灭吴的有利时机,与越国呼应合作,合并了淮北、泗上之吴国故地。随后又灭掉淮北的陈、许、蔡、杞等小国,过去在东境(淮河中游)长期受到的来自吴国的军事威胁消除了。这时期,楚国的内部相对稳定。但对比三晋、田齐在变法革新后的崭新局面,楚国还处于落后状态。

(二) 战国中期楚国的变法、强大与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

公元前387年以后,楚悼王(公元前402~前381年在位)在吴起(久在魏国参加变法革新工作的卫国人)的筹划与帮助下开始变法,大力削弱贵族特权,规定贵族的世禄以三世为限。他认真推行法治。任人唯贤,裁减冗官,节财(主要是节省供养贵族的费用)练兵,特别注意开发江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提到,吴起曾“南平百越”,这说明楚国向南曾取得很大进展。他曾针对楚国地广人稀(主要是江南)、不同地区开发不平衡的情况向楚王建议:“令贵人实广虚之地。(贵人)皆甚苦之。”^①这种要求贵族们带头,领着自己的属民和奴婢去边地开荒的移民政策,自然招致贵族们的强烈反对。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一死,贵族立即发动政变,杀掉吴起。但革新势力终于镇压了政变,消灭了部分贵族,保存了变法成果。不过此后的做法又趋于温和。对比二三十年后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其力度就差多了。

吴起变法之后,楚国的国力增强了。由于领土广大,得天独厚,开发的潜力大于其他国家。楚国在争霸战争中屡经挫败,仍能屡仆屡起,始终是大国。

下游的越国则每况愈下。公元前379年(越王翳三十三年),越都自琅琊南徙于吴(吴国故都,当在淮东),介于齐、楚两大国之间。公元前334年,楚、越发生战争,楚大败越,此后越益弱。终于在公元前309~前306年间,为楚所灭。越人残余势力退到长江以南较落后的地区,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②

楚破越(公元前334年)以后,进入鼎盛时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③后来,楚统一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经济文化都有了显著发展。这从近年出土的大量楚文化遗存中绝大部分属于战国时期,而且质量也比上一阶段有显著提高,可以得到印证。可见,楚文化传播广远的高潮时期,就在此时。被楚国陆续合并的诸小国,不但领土统一于楚,文化也日趋合流。这从后来《史记》所记秦末农民起义时江淮以南各地(也包括淮北部分地区)人民之被称为“楚人”,以及《货殖列传》所记“三楚”地区之划分,也可看出战国时楚族及楚文化兼容并包,不断吸收新血液的高度融合力。

楚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带,继续在以楚郢都为中心的汉水中游地区。但由于楚国领土广大,因而必然会在一定的自然区范围内,在各地原有历史基础上,形成地区中心城市。

郢都是楚国最大的城市。东汉初年的桓谭在所著《新论》中曾描述说:“楚之郢都,车毂击(车轴相撞,形容街上车子之多),民摩肩(在街上走路,人们擦肩而过,形容人群非常拥挤),市路相排突(街上走路,到处碰撞人),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早晨穿的新衣服,晚上就挤旧了)。”^④话虽不免有夸张处,但城内人口多,市面繁荣的情景,却可以想见。郢都北面约40里(今里)处,又兴起了一个陪都——鄢(应在今宜城县北20里外,不在县南,考另详)。郢、鄢分别为楚国的都城与陪都,都位于宜城平原上,由此可知,这一汉水中游最大的平原,其农业生产必然已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有效地供应这两个都城及其他较小城邑中人口的粮食。宜城平原地势较高,不易淹水,而上游又有水源可供灌溉。传说楚庄王时,令尹孙叔敖(又是著名的水利专家)就曾引沮水灌溉。战国时,曾在鄢都(汉晋宋宜城县)东面开渠,引鄢水(今宜城北、小河镇南)灌溉附近田地。此外,楚人又曾“通渠汉水云梦之野”^⑤,当在今钟祥平原上。在淮河流域,春秋中期已有孙叔敖主持兴建的著名的期思陂(今河南固始县一带)。这时,在大兴水利的大背景下,必然会有新发展。而另一个更著名的楚国大型水利工程,是位于寿春(今安徽寿县)城南的芍陂(今安丰塘),至迟在这时已兴建。史学界据《后汉书·王景传》,说是孙叔敖所修,恐误。《王景传》所记此事,也同其他一些古记载有矛盾(特别是在地理方面)。尤其是春秋中期,孙叔敖在世时,今寿县以南尚非楚国能稳定统治的地区,似不大可能于此时兴建。估计其始建时期,特别

① 《吕氏春秋·贵卒》。

② 《史记·越世家》。

③ 《战国策》卷十四《楚策一》。

④ 《北堂书钞》卷一二九。

⑤ 《史记·河渠书》。

是发生效益时期,恐当在楚灭越以后。《续汉书·郡国志》“扬州九江郡当涂县”下刘昭补注引《皇览》记,葬于淮南当涂县东(今安徽怀远县东南)的楚大夫子思是“造芍陂”的主持人,似较可信。总之,当时楚国境内的水利灌溉事业是有显著发展的。

这时期,楚国境内的工商业及水陆交通也都有新的进展。著名的“鄂君启节”(有舟节及车节,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就是楚怀王(公元前329~前299年在位)在公元前323年颁发给封在郢邑的大贵族名启的水陆交通运输特许证。^①这两个节文中涉及的河流与城邑很多,其定位问题,解释不一,迄无定论,这里暂不具体论述。但总起来说,至少可使我们从舟节中看到,以郢都为中心的一系列重要河流都已通行成批的船只,从车节中看到一条从南阳盆地出方城通往淮西的重要陆路交通线。如果我们联系这些年陆续出土的楚国货币——郢爰及蚁鼻钱的广泛分布情况,就更可看出当时楚国境内商业贸易已达到了古代相当高的水平。

工业方面,这些年战国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铜器与铁器,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特别是中期的冶炼水平。而1973年在大冶铜绿山发现的春秋战国时的矿冶遗址,更反映了长江中游地区久已利用这一至今仍著称于全国的矿山,从事铜、铁的开采与冶炼,并已有一定的规模,且某些采冶技术已超过初期。特别是战国中期,楚国统一长江中下游、交通运输进一步畅通之后,这里的产品对周围地区以至全楚国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战国时,楚国宛县(今河南南阳市)的冶铁中心,生产著称于当时的铁器和铜器,而它极有可能是通过水路运输,得到大冶的矿石原料的。

总之,在我国古代社会,工商业的发展,总是以农业发展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养活大量非农业人口。所以,楚国工商业在本时期达到的水平,也必然反映了当时长江中下游的农业开发水平已有新的提高。

(三)战国晚期楚国经济文化的东移与楚之灭亡

战国晚期从公元前278年楚都东迁开始。事实上在战国中期的后半期,楚国已开始走向衰落。最早的标志是公元前312年秦楚丹阳(今河南省淅川县境)之战,秦大败楚,略取楚之汉中地。楚国西北边境开始削弱。后几经起伏,秦国采取一打一拉的办法,逐步蚕食楚之西北边境地带。公元前301年,由于楚国一度与秦联合,共同对付齐、韩、魏,招致三国联兵攻楚。垂沙之战,大败楚军。南阳盆地北部宛城一带及方城外叶县一带分别被韩、魏所并。但这时楚国在东部仍有进展。公元前309~前306年之间,灭了越国,势力延伸到江南。

公元前286年,齐缙王攻灭宋国。公元前284年,曾被齐国攻占、后来复国重振的燕国,在燕昭王和乐毅的领导下,联合赵、韩、魏、秦,以五国联军攻灭齐缙王政权。楚国则乘机出兵占据了齐国新得的淮北部分宋地。

但公元前280年以后,秦又大举攻楚。先据南阳盆地,然后过汉水进入宜城平原,公元前279年取郢。公元前278年攻下郢都。随后又东南进至钟祥平原,占据竟陵。汉水中游丰腴之地至此全部并入秦国。楚人在此前后,大批东迁到淮河流域。楚顷襄王(公元前299~前263年在位)最初定都于陈。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十年),又沿颍水向东南,迁都于钜阳(今安徽太和县)。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又南迁到淮河南岸的寿春,直到公元前223年,楚昌平君死,楚灭于秦时为止。

楚人大批东迁以后,汉水流域的楚文化显著衰落。秦人在汉水中游也兴修了一些水利灌溉工程,如白起渠,即今宜城平原上的长渠前身。渠首为今武安堰,在今南漳县武安镇附近。堰、镇皆为纪念白起(封武安君)而命名,流传至今。但总的说来,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楚人大批迁走,此地的经济已无法恢复到原有水平。

楚人的另一部分,向南迁徙,“遵江夏以流亡”^②,退到长江边今江陵一带。在这里站住了脚,打退了南进的秦兵,收复了“江旁十五邑”,在过去经营南方的基础之上,扩建了新的中心城市(今纪南城遗

① 据《说苑·善说》,楚怀王母弟为郢君子皙,可能即郢君启之字。

② 《楚辞·九章·哀郢》。

址),并向长江以南移植,沿着今湘、资、沅、澧等河流,与当地土著“蛮”族共同开拓今湖南省境,取得一些进展。今湖南省境的战国晚期楚墓较多,特别是沿湘江两岸,长沙附近尤为密集。这也反映了楚人在战国晚期,尤其是东迁以后,有相当一部分人移居到湖南,而尤以湘江流域长沙一带为多。

楚人大批东迁淮河流域之后,趁秦军移主力进攻韩、魏并与赵国争战日烈之时,稳定了内部,进一步开发淮南。芍陂水利工程,至迟在这时应已产生显著效益,为寿春城的兴起,提供了粮食供应基地。寿春城位于鸿沟(贯通中原的运河)南端,北通大梁(魏国首都,在今河南开封市),成为黄河、淮水之间的水上交通要冲。此后,由秦汉至六朝,寿春(东晋以后改名“寿阳”)一直是淮西的中心城市、军政重镇。直到隋统一后,修建大运河,河、淮之间的水路交通线,主要经通济渠(唐代改称“广济渠”,通称“汴渠”),东南流至今江苏盱眙县北入淮,沿淮东北行至山阳(楚州治所,今淮安),转入山阳渚(江淮运河),南至长江。此后,寿春的重要地位始被楚州取代。

楚东迁以后,经过一段喘息时期,至考烈王(公元前263~前238年)时曾一度复兴。这时,春申君(战国“四公子”之一)为相,以淮河流域为重心地区,经济上有所发展,文化上也继承了东迁前楚郢都及汉水中游的地位,成为楚文化的新中心,“楚辞”也在淮河流域大为流行。在军事、政治上,乘秦、赵两军集中主力在上党(今山西省东南部上党地区)一带进行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战争——长平之战(公元前262~前260年)时,出兵北攻鲁国,占领了徐州(今山东省滕县南)。公元前256年,在上一年魏国信陵君率军救赵(楚也出兵支援)大破围攻赵都邯郸的秦军以后,楚趁机出兵灭了鲁国。

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楚春申君的封地12个县都在淮北,邻近齐国。为了巩固楚国东北部边防,于公元前248年献给楚王,改立为郡。春申君在当时掌握楚国大权,为相25年,是较有作为的王族。吴国故墟由他主持重建,成为自己新封地的首邑。淮东的吴国故地,经过他的大力经营,必然有所发展,楚人的迁入者当亦增多。因为40多年后,汉初的荆王刘贾受封于淮东时,还能以吴为都城(见前述),可见,其发达程度较高。所以我们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开发,对于春申君受封于吴的史实是不应忽视的。

顺便也应提一下,现在的上海又称为“申”,是来源于春申君的封号;黄浦江又称“歇浦”,亦因《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春申君名“黄歇”之故。这其实是后人为上海寻找渊源而形成的附会之说,认为吴都在今苏州,上海离苏州很近,春申君既封于吴,自然应包括上海,于是上海的渊源就这样与春申君挂上了钩。其实,春申君所封之吴应在淮东(见前述),并不邻近上海;而黄歇也未必就是春申君,《史记》误合二人为一,前人已有考证。因此,对上述附会之词应慎重,不可轻信。

楚国东迁以后,共持续55年,终灭于秦。公元前226~前225年,秦开始派遣李信、蒙恬以二十万众攻楚,楚将项燕大败之。于是,秦始皇只好听从老将王翦原来的建议,出兵六十万,由王翦统率,以稳扎稳打的方式,终于在公元前224年,大败楚军于平舆(今河南平舆县南)。俘虏楚王负刍。楚人退守淮南,立昌平君为楚王。公元前223年,秦军攻下淮南,取寿春。昌平君、项燕死,楚亡。公元前222年,王翦进一步平定长江下游的楚江南地。中游“纪南城”遗址一带,当亦于此时或稍后陷于秦。古城之毁废,当在此时,至迟不过公元前214年秦平南越之时。

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对楚最费力,使用兵力也最多。楚人的反抗最激烈,并一度大败秦军。十几年后,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楚人又是灭秦的主力。最后统一战争中,两大对立集团的首领绝大部分骨干仍是楚人。这都说明,从战国晚期以来,楚人一直是较活跃的力量。其所以能如此,当与楚国境内,首先是北部开发潜力大、经济文化在继续发展有关,而东迁后的楚国能一度复兴,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社会基础的。